



##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 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建构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9-04

[作者] 李春红

[单位]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不再扮演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角色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文学的从中心到边缘,与经济发展及多元文化的形成有关,但与政治的关系也不得不提。可以说正是二者关系的疏离加速了文学的边缘化,文学不再充当政治的感应神经,政治也不再需要文学的煽情鼓动。政治对文学的松绑成就了文学,在疏离的状态中,文学和政治关系才有了走向常态的可能性。但因为政治对整个20世纪尤其是1949年后的文学曾经施加过巨大影响,这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事实。故,今天的文论建设若不反思这段历史,不仅失去的是历史的经验,也可能失去的是文论建设的资源。因此,重新审视二者的关系,并从这一角度勾勒与丰富20世纪中国文论史的复杂变迁,也许不无必要。

[关键词] 苏州大学文学院;文学;政治;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不再扮演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角色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文学的从中心到边缘,与经济发展及多元文化的形成有关,但与政治的关系也不得不提。可以说正是二者关系的疏离加速了文学的边缘化,文学不再充当政治的感应神经,政治也不再需要文学的煽情鼓动。政治对文学的松绑成就了文学,在疏离的状态中,文学和政治关系才有了走向常态的可能性。但因为政治对整个20世纪尤其是1949年后的文学曾经施加过巨大影响,这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事实。故,今天的文论建设若不反思这段历史,不仅失去的是历史的经验,也可能失去的是文论建设的资源。因此,重新审视二者的关系,并从这一角度勾勒与丰富20世纪中国文论史的复杂变迁,也许不无必要。一在“文革”结束后的头两年,理论界主要是对帮派文艺进行全面批判,“文艺界对帮派文艺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历次政治批判和政治运动的自然延伸”。(1)虽然这一批判具有合理性,可其思维方式、批评语言依然留有“文革”遗风,并且受“两个凡是”的影响,这场批判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展开的。直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的发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才真正拉开序幕。之前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曾形成三种概括:一是“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工具论”;二是“文艺从属于政治”的“从属论”;三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服务论”。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反思首先从对“三论”的反思入手。其中,以“工具论”的反思为发端,并逐步深入到对“从属论”和“服务论”的讨论,最终演化为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全面探讨。较早对“工具论”提出异议的是《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3)文章指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提法如果只是指某一部分文艺作品所具有的某一种社会功能,是合理的,但如果把涵盖的对象扩大化,认为全部的文艺作品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则合理就变成了歪理。并指出将这种提法作为文艺的定义,不利于题材、体裁的多样化,不利于文艺的百花齐放,结果会造成文艺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文章还认为文艺的政治作用虽然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文艺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也决不能仅仅用“阶级斗争的工具”来概括。不能离开文艺的特征,把文艺家变为政治鼓动家,把文艺变为单纯的政治传声筒。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以《上海文学》为阵地对“工具论”展开热烈的讨论。有的站在赞同“工具论”的立场对《为文艺正名》提出了批评,(4)有的则在肯定《为文艺正名》的同时,对坚持“工具论”的论者提出批评:不能因为某些革命前辈曾经间接或直接肯定过“工具论”这种观点,就全盘接受“工具论”。探讨这个问题的正确与否,应当从实际出发,用文艺实践来检验这一口号的科学性和实际意义。(5)随后,王云缦、文致和等人也撰文对之前赞同“工具论”的文章提出不同的意见。(6)1979年上半年《长江文艺》也就这一口号展开了讨论。虽然就这一年的讨论看还存在诸多分歧,但其真正价值不在于到底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而在于这样的讨论为深入探讨《讲话》中的其他问题开了头,表明《讲话》不再是理论禁区,也使得人们在《讲话》的思维空间之外另辟新的论域成为可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的讨论显得不深入,但如果就他们在思想已经极度板结的状态下开辟一小块自由思考的园地而言,那时迈出的这一小步,却是极具理论勇气的大跨越。对“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一提法,讨论者多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学说作为理论依据,认为文艺和政治同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们之间是平行而非主从关系。当时较有影响的文章是刘纲纪的《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和蔡厚示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之特殊性》。(7)

由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又从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找到了反驳的有力论据，文论界的共识大于分歧。“文艺为政治服务”也是当时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话题。有学者直接反对这种说法，如王春元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个错误口号》（8）就如此。作者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他从三个方面给予论证：一、从三十年的文艺实践看，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强制性；二、这个口号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只说过它们之间有相互影响关系，文艺和政治都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三、毛泽东在很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提出这个命题，并不是发展。王春元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是以政治永远正确、一贯正确为前提的。政治不可能是永远正确的，政治上出现了错误，怎么还能提文艺为政治服务呢？王春元的论证体现了充分的逻辑性。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持肯定意见的学者则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在整个上层建筑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文艺要为政治服务。（9）还有一种是将政治概念泛化，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三个口号是一样的，没什么根本的区别。只要是生活着的人，就脱离不了政治，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10）。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无论赞同与反对，都没有脱离政治这个中心，往往是从政治本身的对错出发来谈文学。虽然有的论者否定了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个提法，却没有真正触及文学本身到底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讨论的与其说是文学的规律不如说是政治的规律。这场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讨论，最终还是通过政治的方式加以解决。邓小平1979年10月30日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以及“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1）的提出和“双百”方针的重申，才真正解放了文艺界、思想界的手脚。在今天看来，这次口号的转变，无疑是拉开了文学回归本身的序幕，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构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以对政治的宽泛理解为依托、以对文学的相对自由追求为目标，标志着新的文学政治学时代正式到来。文学界开始关注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开始关注人的本身与文学本身，文学的审美意识获得了重视与肯定。二论新时期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建构的进一步发展，首先要提到的是刘再复的《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论文学的主体性》等文章，他在文学研究中建立了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用之反思文学与政治关系，突破了文学政治学的视野而进入了文学人本学的范畴。如刘再复强调人的自身的复杂性，要恢复人的主体性，是不满于把复杂的人性简化为阶级性，想用“复杂性格”这一概念重新唤起人们对于人的复杂性的认识与理解。不可否认，相对于仅仅是运用政治术语来图解文学的习惯性思维来说，刘再复的立意是新颖的。但试图用“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这个公式来言说文学并作为打开人性迷宫的一把钥匙，则又失之偏颇。在人们热烈讨论文学与政治关系之际，现代西方的哲学理论与文学理论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中国文论研究中，并在1985年达到了巅峰状态，从而使得学界将这一年命名为“方法论年”。其间有两大流向显示了中国文论界的理论亢奋，其一是人文主义流向，出现了文艺心理学、艺术文化学、接受美学、现象学等；其二是科学主义流向，表现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大量引进与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模糊数学、统计学等学科的概念和范畴如系统、信息、控制、层次等被搬进文学研究，一试有效性。这些都大大拓展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使得“阶级”、“斗争”、“阵线”、“工具”等批评用语，终于慢慢地淡出了文论领域。由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言说所建立起来的批评视角，已经被多样化的批评实验所取代。在这样的过程中，文学政治学的疆界缩小了。这未必不是文学政治学在受到挑战后获得了重新定位的机遇，能够抓住这个机遇，文学政治学才能回归学科特性，获得真正的发展。至此，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与建构，已经不可能再在一个毫无理论上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进行了。这不是说文学政治学已经完成，而是表明，要建构新的文学与政治学的架构，必须更新思路，以不再造成对于文学本质的误解为前提，这样才有可能性与合理性。摆脱原有的一元化思维习惯，重新思考政治的含义，约束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题范围，采取更为宽容开放的文学研究态度与方法，已经成为建构具有真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政治学的首要难题。在中国现代的文论实践中，不是没有文学政治学的研究传统，而是缺少了反思这种传统的理论力量，在无限放大政治批评的情境中，不仅压制了其他批评模式的多元发展，也桎梏了文学政治学这一学科的正常发育与演变，更谈不上积累理论经验创造属于中国的文学政治学的真正的理论体系了。三

总之，新时期文学与政治新关系的建构活动已经以一种相当活跃的方式崭露头角了。其一，结束了文学从属于政治的主流观点，代之而起的是邓小平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12）这不仅使得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体化，也使得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多样化。如果说为社会主义服务更多地体现了原有的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内容，那么，为人民服务则显得相当广泛，这就使文学功能有了拓展，能够以更为多样化的方式作用于社会，作用于人类。同时，邓小平又将人民与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3）。结果，由于社会主义概念更加突出人民利益这一主导内涵，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同时是为人民服务，摆脱了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对立所造成的阶级对抗。此时的文学政治学所强调的文学与政治的关联，其实

是文学与人民的关联，为文学全面地与人民相结合，与生活相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保障。稍后，有学者在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时，将“为人民”视为逻辑起点（14），正是对邓小平文艺思想的一种运用与发挥，可见，为政治服务已经转化为一个更为宽泛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理念了。这对启发后来学者提出“人民文艺”或“人民文学”的观点，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其二，突出了文学的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区分。王春元等人的观点，其实是想表明文学既有内部规律，也有外部规律，不能简单地用外部规律来取代内部规律。虽然可能有学者过分强调了内部规律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外部规律，未能在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之间找到融通的渠道，但对于内部规律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就是否定外部规律。新时期的反思者其实没有多少是真正的审美主义者，他们在强调内部规律的重要性时，未敢彻底斩断外部规律与文学的联系。这就是中国的文论界未能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形式主义批评流派的原因。何况，在内部规律说盛行之际，来自传统的观点仍然在证明外部规律的重要性，这构成了对峙，同时也就为重新思考外部规律重要性留下了理论的空间与可能性。陈涌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对刘再复的观点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刘再复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概括为文学的“外部规律”，是非常错误的。陈涌强调：“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这个观点是颠扑不破的。”“离开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离开了现实生活，对任何重大的文学艺术现象都不能做出合乎事实的本质的规律性解释。”（15）从陈涌的观点不难看出，他是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讨论文学问题，并将这样的讨论范围视作文学研究的唯一范围，所以，他对于刘再复逸出《讲话》的理论疆界的做法，持否定态度。运用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来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走到了文学与政治划清界限的时候，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二者间有了界限，就证明二者没有关系了。因此，这时候，出现重视外部规律的理论声音，也显示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建构既面临了挑战，又具有继续研究的有效性。其三，恢复了文学表现人及生活的活力。在僵化地理解文学与政治关系时，文学变成了对于政治的图解，概念化、公式化的创作，激发不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获得不了审美的娱悦。经过反思与证明，文学的世界应当是创造活的人物与表达活的思想情感的世界，惟有表现了人，表现了人的复杂而丰富的思想情感，才能引起读者的审美注意。刘再复在《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一文中，就用大量笔墨论证了性格的复杂性，指出若是将人简单地政治化，“是人为地把人自身贫乏化，导致了文学的贫困化，也导致了民族精神世界的僵化。”（16）何西来发表《主体意识的觉醒》（17）的文章，对刘再复当时一系列“以人中心”研究表示支持，认为“以人为中心的思维”这一命题包含了人与历史相联系的内容在内，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在文学上的反映。在何西来看来，重视文学活动中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力量问题，本身就是一种贡献。钱谷融在50年代主张“文学是人学”，这是接着说的，当年的钱谷融受到了批判，可在80年代，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已经与文学政治学并驾齐驱，各自证明自己的理论有效性，又潜藏着交流与对话的可能性，文学表现人与生活的能力当然极大地提高与拓展了。总的来看，新时期，由于重新反思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突出了人的地位与文学的地位，限制了政治批评的绝对权威作用，一方面是文学研究向多方面的发展，这就是文学本体学及相关交叉学科的出现；另一方面就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有效性受到挑战，从而缩小了文学政治学的有效范围。这应当是中国现代文学政治学的一次必要的理论转型，即从特定的革命与战争年代所形成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特殊形态之下解放出来，从开放时代与大众文化时代的新情境中来重建自身的理论话语体系。但由于随后的学界已经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置于边缘地带，在意识与潜意识中产生了某种排斥感，搁置了这类争论，使得围绕着毛泽东《讲话》和邓小平理论所建立的政治批评传统，作为一种理论资源，在文学与政治关系新建构理论活动缺乏应有的进步探讨，这是十分可惜的。注释：（1）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1895—1990），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86页。（2）《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3）评论员文章，《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4）王得后：《给〈上海文学〉评论员的一封信》、吴世常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个科学的口号》，《上海文学》1979年第6期。（5）邱明正：《一个不精确的口号——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年第8期。（6）王云缙、陈敦德《“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个反科学的口号》、文致和《就“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和王得后等同志商榷》，分别载《上海文学》1979年第9期、第11期。（7）分别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第4期。（8）载《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3期。（9）敏泽《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文艺研究》，1980年第1期。（10）丁玲《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3期。（11）《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日报》，1980年7月26日。（12）（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256页，第163页。（14）参见李衍柱等《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年。（15）《红旗》1986年第8期。（16）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4页。（17）《文汇报》1985年11月25日。

